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五四运动



一、“五四”运动的酝酿及其原因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4月底到5月初，巴黎和会的噩耗频频传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日益暴露。5月3日，北京内城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千余人的集会虽时近午夜才结束，但人们并没有去休息。座落在景山东街的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灯火通明，青年学生们正在分头忙碌着，准备着。他们在一面面布的、纸的旗帜上，挥毫泼墨，苍劲有力地写上：“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第二天即5月4日，数千名学生从古城北京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勇敢地肩负起历史与时代赋予他们的伟大使命，掀起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当时，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以及由这一场危机引发的五四爱国运动，都是紧紧围绕着日本侵占中国山东及其权益问题发生的。所以，“五四”前夕，中国不少报纸，都在显赫的版面上写着：“外交大失败警耗！”“山东问题之最后五分钟！”

山东，是我国北部的一个临海省份，面积15万多平方公里，其东部山东半岛伸入渤海、黄海之间，半岛两侧的胶州湾、威海、烟台、龙口等地，有适宜于建设军、商港口的良好地势。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割地狂潮”中，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两名德籍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大刀会众所杀），派舰队攻占了胶州湾。次年3月，又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准将山东省胶州湾地方借与德国；准许德国在山东建造胶（州）济（南）铁道；铁道附近左右30华里的矿产，德人有开采权。这样，整个山东省便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青岛和胶州湾也俨然成了“国中之国”。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先后有33个国家卷入这次世界大战。战争双方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奥、匈、德称为“同盟国”；英、法、俄称为“协约国”。日本、意大利和美国，都是在战争爆发后才陆续参加到“协约国”方面的。日本参战的目的，是想趁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因此，1914年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后，即派日军两万余人在龙口登陆。9月26日起，日军伸入山东内地；11月7日，占领青岛，青岛德军向日本投降。至此，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全部为日本所取代。

日本的侵略胃口很大，它不只是一定要夺取山东，还要独占全中国。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亲自递交了“二十一条”。该条约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问题。日本不仅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它继承原来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并要求取得各种新的特权。第二号，要求享有独霸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权利。第三号，要求享有独霸汉冶萍公司及其附近矿产的权利。第四号，要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第五号，要求享有操纵中国政治、财政、军事和警察机关的权利，并把福建、江西、广东等省，事实上划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很显然，这是一个旨在灭亡全中国，排斥第三国在中国扩张势力，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殖民地的条约。为了避免引起第三国干涉，日置益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时，曾要求“迅速商议解决，并守秘密。”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要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就不仅担心会遭到第三国（主要是英、

美)的干涉,还担心会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抗。因此,袁在谈判中迟疑不决,并一再要求日本让步。对此,日方极为不满。5月7日下午,日置益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声言:“二十一条”第一、二、三、四各号,和第五号中关于福建问题的条款,“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否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这时,袁世凯正急于复辟帝制,梦想早日登上皇帝宝座。为了换取日方的支持,5月9日,袁世凯表示完全承认日本的要求,并命令外交总长陆徵祥在条约上签字。从此,5月7日就成了中国人民的国耻纪念日,而直接负责办理“二十一条”交涉的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輿,也就成了中国人民最痛恨的卖国贼。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决定实行帝制,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但不到半年,他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和讨伐声中死去。袁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1917年,黎元洪下台,大总统的职位由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冯国璋接任,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握在段祺瑞手里。

段祺瑞的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本的授意下,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宣布中国对德、奥处于战争状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原先日本不同意中国参战。如果当时中国对德宣战,势必会影响到日本所取代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可是,到这时“二十一条”已经签定,1917年初,日本又同英、法、俄、意4国达成了秘密谅解的协议:4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负责使中国对德宣战。这个秘密谅解的协议,就成了日后在巴黎和会上日本拒不退还山东的一个借口。

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后,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而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也想趁机再从日本那里获得一笔借款,于是,又把山东的权益向日本作了进一步的出卖。1917年9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照会中国驻日本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以及在经营和管理胶济路方面日本享有种种特权,实际上是要以此作为借款的条件。章宗祥立即于同日复照,不仅逐条、逐句,一字不漏地把后藤的照会照抄下来,而且表示“欣然同意”。这份“欣然同意”的换文,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就成了日本拒不退还山东的又一个借口。

1915年初,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后,中国留日学生2000余人举行集会,表示抗议,并通过了“全国一致,抵御外侮”的决议。2月底,留日学生代表回国。接着又有500余人回国。他们敦促政府从速采取对策,并同上海学界一起,开展爱国救亡运动。5月,袁世凯政府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的消息传出后,留日学生总会立即召开会议,表示坚决反对,并向国内发出了《敬告全国父老书》的电文,向全国同胞呼吁:“举国一致”,“众志成城”。这些,对当时国内爱国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17年,正当帝国主义激烈争战的时候,在“协约国”一方的俄国土地上,响起了十月革命的炮声,苏维埃政权诞生了。日本妄图借此机会,代替原来帝俄在中国北满地区的统治,并进而侵占俄国西伯利亚的广大领土。为此,1918年2月5日,日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以“俄国情势于联合国(即“协约国”——编者)日形不利”为借口,向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商谈中日两国应在军事上共同行动问题。不久,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日军可以在中国的北满等所谓“军事所要之地图及情报”。

当地的中国地方官员，则要对日军的行动“尽力协助”。在日军进犯苏俄时，中国不仅有义务派遣军队，而且其行动“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

中国留日学生在上述协定尚未签订时，就得知了协定的有关内容。1918年5月初，他们在东京举行集会和游行，对《协定》表示严重抗议，遭到了日本警察的侮辱、殴打，并被捕多人。为抗议日方的侮辱和暴行，学生们纷纷罢课回国，从5月到8月，回国者达2000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的2/3。黄日葵、李达、李汉俊等，都是这时回国的。

5月21日，北大、高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高工（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法专（北京法文专修馆）等校的学生2000余人，走出学校集合在新华门“大总统府”门前，要求取消反动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他们推举了8名代表，去见当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冯国璋。冯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

尽管这次请愿运动没有结果。但是学生们感觉到有组织起来的必要。于是，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最初的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参加的不限于北京大学，有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为了加强联系和扩大宣传，学生救国会还在北京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其宗旨是：（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但该杂志的实际内容，要比这个宗旨表现得更为激进。许德珩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一文中，对封建军阀给中国造成的种种悲惨情景，表示了极大的愤懑，决心要“一饮此强悍专横者之血之肉，以雪吾愤”；对于外国侵略者，更表示了不屈的斗志，声言“虽冒万死与之争，犯大事与之战，亦不可惜。”这种鲜明的爱国立场，基本上反映了《国民》的政治倾向。因此，它一问世，就能比较积极地配合当时正在酝酿和兴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并加强了爱国学生之间的联系。但当时在社会上和青年学生中影响最大的刊物，还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杂志，就是这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新青年》一问世，就高举民主和科学（即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向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比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是自1912年辛亥革命失败后，在死寂沉沉的中国思想界发生的巨大震动。它标志着一场新旧思想文化的战斗，已经登上中国社会政治舞台。

《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创刊，（社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79号）。它采取4开小型报纸的形式，每星期出版1号，每号都有国内外大事评述和社论。陈独秀常用“只眼”，李大钊常用“常”或“守常”等笔名发表文章。这个刊物从创刊起，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德、奥等国的革命斗争和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同时，又继承了《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学，反对封建文化、道德的传统。它是当时全国革命性和战斗性最强的刊物，在社会上，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大影响，事实上成了五四爱国运动思想舆论准备方面的一个指导性刊物。因此，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已经同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于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传来后，一场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反帝爱国运动便首先在北京拉开了序幕。

二、“五四”运动在北京的爆发

经过长期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反帝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爆发了。5月4日，是个星期天。上午10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警官学校、医学专门、农业专门、汇文大学、铁路管理、法政专门、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13所学校的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讨论和研究下午有关游行示威的具体办法。

中午过后，各校参加游行的队伍，就按照预定计划，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涌向天安门广场。高等师范和汇文大学的队伍到得最早，其他各校的游行队伍也陆续到达。在广场上，每到一批学生，先来者就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后到者则挥舞手中的旗帜表示敬意。北京大学是这次示威游行的发起者，但他们的队伍到得最晚，因为当他们在沙滩红楼操场集合准备出发时，突然遭到了北洋政府教育和警察总监派来的代表的无理阻拦。经学生代表邓中夏、黄日葵等人据理力争，这两个代表被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学生才冲破阻拦，经北池子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时已是下午1时半了。

这天前来参加集会游行的共有3000多名学生。他们人人手持小旗，上边书写着标语口号：“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勿做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中国宣告死刑了”、“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用自己鲜血书写的“还我青岛”4个大字，也悬挂在天安门前，使整个会场的气氛更为悲愤。

冲破了军警的拦阻，集会宣布开始。一名北大学生代表登上放在华表前的一张方桌，宣读了事先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同时，学生们还散发了一份由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白话文传单：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出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道。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出中华门，奔向东交民巷使馆区。但事与愿违，学生队伍在英、法等国使馆，不仅没见到公使，甚至连递意见书也遭到拒绝。到日本使馆门前，被日本卫兵阻止，不许入内。这时，北洋政府又派来大批军警准备镇压学生。中国还没有亡，中国人就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通行，这使得学生们义愤填膺，怒火满腔。于是决定去找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曹汝霖算帐。游行队伍从东交民巷西口往北走，经富贵街、长安街、东单，再往北折，经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大关宜宾胡同来到赵家楼曹宅门前。这时已是下午4时半了。

这天中午，大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宴请刚由日归国的章宗祥，曹汝霖应邀出席作陪。席间，传来了学生示威游行和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消息。宴会结束时，有人劝他俩暂避一时。他们无视学生的力量，认为武装的军警完全可

以把赤手空拳的学生镇压下去，于是在下午2时半毫不介意地回到赵家楼曹宅。

愤怒的学生见曹宅大门紧闭，门前由三、四十名警察守卫着，无法入内，于是便将手持的小旗抛入院内，连声高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守卫的警察企图干涉学生的正义行动，但是愤怒的学生并不畏惧他们。这时有五位勇猛的学生跃墙跳入院内，从里边打开了曹宅的大门。在外等候的学生一拥而入。学生冲入曹宅后，首先进入前面大厅。厅内空无一人。学生一怒之下，将厅内陈设的一些名贵家具抛出室外，将墙上悬挂的日本天皇像摘下来摔在地上。之后，穿过花园，进入客厅。章宗祥和日本记者中江丑吉正在这里。学生见到章宗祥，怒火万丈，将他痛打一顿。章躺倒装死，后在日本人保护下逃到同仁医院住院治伤。

学生到处寻找曹汝霖，始终未见到他的踪影。找不到曹汝霖，学生们异常气愤，为了惩戒卖国贼，有的学生在曹的内室放了一把火。顿时曹宅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眼看卖国贼的巢穴即将化为灰烬，学生们才开始散去。

曹宅起火半小时后，北洋政府的步军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局监吴炳湘率领大批军警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经离去，未及走脱者遂被反动派逮捕。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家中召开内阁紧急会议，密谋镇压学生运动的措施。在对付学生的办法上，统治阶级内部的意见颇不一致。执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等主张严厉镇压爱国运动，严办被捕学生。而大总统徐世昌和教育总长傅增湘等则主张采取怀柔政策，释放被捕学生，以缓和民众的愤慨情绪。

5月4日晚，在北洋政府密谋对策的同时，北京各校学生也在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同学和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蔡元培当晚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大会，他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但劝阻学生不要罢课。至于被捕学生，他保证竭力设法营救。愤激的北大学生没有采纳蔡的意见，决定联络各校学生实行罢课。

从5月5日起，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学生们在罢课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如下要求：致电巴黎和会，不承认“二十一条”，将山东、青岛直接归还中国；致电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立免曹章诸贼之职，以正其卖国之罪。”罢课学生表示：“国权一日不复，国贼一日不去，吾辈之初志一日不渝。”并呼吁社会各界与学生“一致联合”，齐心协力地去“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学生罢课提出的要求，代表了全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的共同呼声。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一致反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倒行逆施。

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虽不赞成学生罢课，但对学生的爱国热忱深表同情，并积极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5日下午3时，14所大专院校校长在北大开会，讨论如何营救被捕学生问题。会议推选北大校长蔡元培、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农业专门学校校长余邦正、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洪镛、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中国大学校长姚憾等为代表，负责与北洋政府交涉。代表们先到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推托责任。代表们又去教育部。因教育总长傅增湘提出辞呈，部中无人负责。无奈，他们再到北洋政府国务院和总统府，但国务总理钱能训和总统徐世昌皆托辞不见，结果徒劳而返。

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释放被捕学

生。

北京学生的罢课，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使北洋政府感到恐惧。北洋政府不得不考虑释放被捕学生了。5月6日晚，吴炳湘向蔡元培等提出，在实现下列条件下，可以释放被捕学生。条件是：（一）明日不许学生参加国民大会；（二）明日各校学生要全体上课。蔡元培当即答应了这两个条件。在蔡的劝说下，5月7日各校学生一律复课。同日上午，被捕学生获释返校，受到各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三、“六三”运动

“六三”是“五四”运动的里程碑，以它为界限把“五四”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从“五四”到“六三”，是运动的第一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动的主力是青年学生；从“六三”到6月28日拒签“和约”，是运动的第二阶段，这时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成了运动的主力。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的两大主力，他们高昂的爱国呼声构成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主旋律。运动发展到“六三”以后，工、学、商采取了联合行动，把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推到了高潮。

北京政府为了扑灭“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烈火，在6月1日接连发布了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公然为万夫所指的卖国贼辩解，替曹、章、陆洗刷卖国罪行，为的是掩饰北京政府媚日卖国的丑恶嘴脸。第二道命令再次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什么“纵火伤人”、“举动越轨”，“以爱国始，以祸国终”，甚至说学生已“构成非法行为，不能不诉诸法律之制裁”，要求立刻停止罢课，“即日一律上课”。并公开宣布“切实查禁”学生们组织的联合会、义勇队等。对“纠众滋事，扰及公安者”，要逮捕法办。

卖国者获得褒扬和保护，爱国者反遭诬陷和镇压，北京政府的这种反动政策使学生们气愤异常。更有甚者，北京警备司令段芝贵和步军统领王怀庆果然奉命行动，悍然逮捕了一批贩卖国货的学生。这就更加激怒了广大学生。他们互相勉励说：昔日田横尚且能带领500人同殉国难，在我国历史上放出异彩，难道我们今天2万多北京学生还不能效法前人的牺牲精神，把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吗！学生们蔑视反动派的高压政策，决定从6月3日起恢复一度中断的街头讲演活动。倘被逮捕，次日加倍出动。倘再被逮捕，次日再加倍出动，直至全部学生被捕完为止。

6月3日上午，北京20余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学生的举动使反动派感到惊慌，他们急忙派出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的群众，逮捕讲演的学生。当天，学生被捕者达178人。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已容纳不下，便把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月4日有700多名学生被捕，北大法科也收容不下，又把在马神庙（今景山东街）的北大理科校舍扩充为临时监狱。

反动派的大逮捕，激怒了北京各校的女学生。6月4日下午，北京15所学校的1000名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学生。

正在此时，从上海传来了“三罢”的消息，北京政府慑于其威力和社会各界纷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民众呼声与压力，不得不释放所有监禁的学生。这再次证明，北京政府的“六三”大逮捕，其结果和反动派的预料完全相反，不仅没有把学生的爱国运动镇压下去，反而进一步激怒了全国人民，掀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特别是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人民，闻讯奋起，要求惩办卖国贼，要求释放北京被捕学生，展开了史无前例的“三罢”斗争。革命烈火燃遍了黄浦滩。

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和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从6月5日起开始实现了。当天，商、学、工、报各团体宣布成立“上海商学工报联合会”，向全国发表通电：“北京政府庇护卖国诸贼，主签亡国条约。北京学生为国请命，突被滥捕毒刑至400余人之多，高压毒手，显非空言所能挽回。此间工商界全体，于本日起一律辍业一日，誓不反顾，乞与应援，涕泣布闻。”“三罢”斗争坚持到6月12日，北京政府罢免曹、章、

陆 3 人的消息得到证实，上海各界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并组织游行，动员商界开市。历时 7 天的“三罢”斗争才宣告胜利结束。

四、爱国热潮席卷全国

（一）天津

天津是当时我国北方的最大商埠，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近在咫尺。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的消息，很快传到这里。天津的学生和各界人民立即响应，掀起了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

5月5日，天津报纸刊登了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示威和被捕的消息，大中学校的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致电北京大学，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们还致电北京政府，反对逮捕爱国学生，要求立即予以释放。

5月14日，天津中等以上13所学校的代表在直隶水产学校开会，宣布正式成立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被选为会长，南开学校的马骏和第一中学的韩致祥（即韩麟符）被选为副会长。在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表示天津学生誓与“全国学生一致行动，全体罢课，再申前请”，并提出了下列6项具体要求：“（一）请政府明白宣布青岛由日本处置一条绝不签字；（二）请将中日“二十一条”协约提出巴黎和会，请求废止；（三）请设法取消民国七年参战军密约；（四）曹汝霖、章宗祥卖国，国人共知，请斥罢交法庭严惩；（五）傅总长、蔡校长教育界泰斗，请收回准免命令，挽留回任；（六）日政府拘殴留学生并侮辱国旗，请严重交涉。”

为了声援北京学生，要求惩办卖国贼、收回山东权益，5月22日天津学生联合会作出一律罢课的决议。从23日起，北洋大学、直隶法政学校、直隶第一师范学校、高等工业学校、南开中学等15所大中学校的1万多名学生开始罢课。以天津学生联合会名义发表的罢课宣言书，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相勾结侵占我领土主权，镇压我国各地学生爱国活动的种种罪行。

天津学生在罢课期间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其中尤以街头讲演和抵制日货最为普遍。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都设有负责讲演的机构，男女各校普遍组织了讲演团。此外还在罢课前后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学生们都约定自己不买和不用日货，有的还决定公开焚烧已有的日货。他们通过讲演和散发传单，广泛进行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宣传。一些学校的学生救国团体致函天津总商会，要求他们在商界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在学生的宣传和推动下，天津商界也积极行动起来，抵制日货，提倡国货。

天津人民的爱国活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动派的破坏。学生罢课以后，反动派的破坏就更变本加厉了。5月26日，北京政府密电直隶省长曹锐，令其“即日将学生演说团一律制止，预防发生意外。”曹接此电后，当晚即与天津警察厅长张韵樵密谋镇压爱国运动。警察厅公开发出布告，诬蔑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徒尚意气，激发事端，招友邦之责言，贻国家以巨患，是其志愿本欲爱国，而其行动适成祸国之媒。”但是，反动派的破坏和镇压，阻挡不了天津人民的革命洪流。“六三”以后，天津的爱国运动进入新阶段。

为了声援北京被捕学生，天津学联6月5日在南开学校操场召集各校学生大会，学联负责人报告了北京政府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情形，号召大家“即至牺牲性命，亦期挽救爱国同志，及唤同胞共扶危局”。全体与会者齐声朗读了宣誓书：“（一）誓保国土；（二）誓挽国权；（三）誓雪国耻；（四）誓除国贼；（五）誓共安危；（六）誓同始终。”开始了罢课请愿活动。6

月10日，天津开始第一次罢市。天津商界罢市，除了受上海“三罢”的影响外，天津学生的推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6月12日起开始第二次罢市，直到6月14日开市。

天津各界人民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增进了联系，加强了团结。为了进一步统一对运动的领导，6月18日正式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参加这个联合会的，除了学、商、教、绅界外，还有报界、女界和回教界。这个组织在后来的爱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在“五四”前夕由日本回到天津，在这里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后来，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参加发起“觉悟社”，成为“五四”时期天津爱国运动的著名领导人之一。

（二）山东

“五四”运动爆发后，山东人民立刻投入斗争。5月5日，刚刚抵达北京的山东国民外交协会的代表，省议会的二名议长，会同众参两院中的山东议员和旅京山东同乡，讨论营救北京被捕学生及山东问题。他们议决了4项：一、参众两院议员中派二人同山东省两议长谒见总统，要求迅速释放被捕学生；二、到警厅与步军统领衙门安慰被捕学生；三、参众两院提案对于“二十一条”、顺济铁路合同誓不承认，请各公使转各国政府；四、弹劾内阁对于山东问题之失败。5月11日，旅京的山东劳动者在彰仪门外广场集会，北京各阶层人士也踊跃参加，到会者有数万人之多。一个与会者在会上表示：“日本夺我青岛，即是夺我山东，即是夺我山东3000万父老兄弟之生命。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报纸反映说，山东劳动人民的爱国热情，较之上等社会尤为激烈。

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山东站在爱国运动前列的也是青年学生。济南各校学生从5月5日起纷纷组织学生团体，上街进行爱国宣传。5月7日，山东各界（以学生为主体）六七百人在省议会召开国耻纪念大会，讨论了罢课、罢市和抵制日货等问题。“五四”后不久，由工专学生代表张文英等召集各校学生代表开会，正式成立了全省学生联合会，作为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机关，并决定以下5项为学联的目的和要求：一，惩办卖国贼；二，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三，拒签巴黎和约，无条件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四，抑制日货，提倡国货；五，争取学生游行示威和讲演的自由。

在北京学生罢课的影响和推动下，5月23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律罢课。济南女子师范的学生和男学生一起，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她们参加罢课、游行、讲演和抑制日货等活动，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时，以济南为中心，全省各地的学生都普遍行动起来。5月12日，济宁学界联合会宣告成立，确定以印刷传单、组织讲演团和抑制日货为联合会的行动纲领。5月15日起，烟台学生罢课两天，17日还举行游行，要求力争青岛、抵制日货。5月24日，在胶济路中段益都的法庆寺举行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国民大会，参加者万余人，一个学生演说至沉痛处，竟咬破中指，血书“赤心保国，身死志存”8个大字，使全场更为激愤。5月31日，临沂2000多名学生游行，宣传不用日货。6月2日，泰安萃英中学学生罢课，组织10人团，在宣言书中表示要和泰安百余学校的师生一起，开展爱国运动，提倡国货，唤醒同胞。

6月9日，济南各界召开代表会，决定10日起全体罢市。广大中小商家

拥护罢市的决定，但以市商会会长张子衡为代表的少数大商号却竭力反对，并向反动当局告密，妄图阻止罢市的实现。10日晨，反动派从城外调入数百名陆军，会同警察荷枪巡逻。各校学生在军警面前毫不畏惧，分头到城关和商埠发动罢市。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多数中小商号的欢迎和响应；尤其上海等外埠在济南所设立的分公司，如广生行、泰康食品公司等，行动更为积极。

6月11、12日，罢市在继续。这时，山东反动当局已获悉曹、章、陆被免职，上海、天津陆续开市。13日，即派数千军警沿街打门，强迫商家开市；并派军警把济南师范学校团团围住，不许学生自由出入。英勇的学生冲破军警拦阻，上街游行，当队伍走到西门大街时又被军警拦住。这时，整个西门大街军警林立，交通断绝。不屈的学生席地而坐，坚持斗争。广大市民对学生的爱国斗争给予热情支持，纷纷送来食品和茶水。学生和军警相持到当晚8点，反动当局才被迫答应了学生提出的条件：一，随便演说；二，撤去包围师范学校的军警；三，商人开市与否任其自由；四，释放因坚持罢市而被捕的商人。到6月15日，胜利结束罢市。

（三）武汉

5月6日，武汉的报纸报道了北京学生5月4日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消息。5月7日，为纪念国耻，武汉各机关学校放假一日。当天，在中华大学召开的运动会上，广泛散发了由恽代英（中华大学中学部主任）起草的传单。传单指出：“现在又是5月7日了，那在48点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密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索我们的青岛，强索我们的山东，要我们4万万人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传单号召人们奋起救国，“勿为亡国奴”。

爱国运动一开始，就遭到湖北反动当局的反对和破坏。湖北省督军王占元、省长何佩瑢一方面增派军警严密警戒，对学生进行恐吓和镇压；同时又一再召见各大中学校校长，令其严密监视学生，禁止学生的一切爱国活动。

但这并不能吓住广大学生。5月10日，武汉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讨论和研究有关救国事宜。主席讲话时“痛哭流涕”，勉励大家说：“我辈青年，此后当以国事为已任，毋使奸人再据要津”。在会上，“数人演说，亦均激昂”，“大多数泪下如注”。一名学生代表突将右手中指咬破，血书“提倡国货”4个大字，全场为之热烈鼓掌，与会者决定，用实际行动“赞助北京学界”。

5月17日，武汉学生联合会宣告正式成立。这天下午，26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开会，正式通过了学联章程，确定学联的宗旨是“热忱爱国，联合感情”。会议还确定了学联的领导机构并推选了职员。当天下午，各校代表齐赴省公署，提出以下4项要求：（一）武汉学生联合会，请示立案；（二）请准发行印刷品，提倡国货，鼓励爱国思想；（三）拍电北京政府，力争青岛，并饬电报局嗣后不准扣留学联拍发的电报；（四）准许组织游行大会，露天演说。

18日，武汉学生第一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这天下午，中华大学、高等师范等3000余名大中学生汇集阅马场，每人手执小旗，上面写着“争回青岛”、“灭除国贼”、“提倡国货”、“抑制日货”等标语口号。游行队伍行经武昌路，出府院街，经察院坡到司门口，转长街至督军署，又经保安正街、大朝街回到阅马场。学生一面游行，一面散发传单和学联的章程、宣言等印刷品。传单用通俗的语言阐明了学生游行的目的，宣传了抑制日货的意

义。31日下午，武汉学联开会，决定为了声援和策应北京、上海的总罢课，从6月1日起，武汉也实行总罢课，并分配了罢课期间各校讲演的地点。10日，汉口商界开始罢市。当时，汉口几十家商店开始罢市。第二天，英租界二码头、法租界特别区、前后花楼等繁华地带的商店均不开业，尤以西药业、书业、海货业和衣庄更为坚决，门口均贴有“罢市救国”、“万众一心”、“不惩国贼誓不开市”等标语。12日，武昌商店罢市。13日，武汉商界得知北京被捕学生已获释，曹、章、陆已免职的确实消息，于是宣告罢市胜利结束。

（四）湖南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敬尧严厉实行新闻封锁，长沙各校学生5月9日才从长沙《大公报》上得悉北京“五四”运动的消息后，就立即行动起来，予以响应。他们散发传单，向各界作口头宣传，建立各校爱国组织，并筹备建立全省性的学生联合会。27日上午，各校学生代表在省教育会开会，正式宣告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成立。6月2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与会者有公立法政、达材法政、第一师范、长沙师范、湘雅医学院等。长沙学生遵照决议首先开始罢课，全省各地学生接连响应。

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教育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省教育会6月7日通电全国教育界，称赞学生的罢课是“激于爱国热忱”，警告北京政府“不谅其苦衷，学校将全体动摇”。它还建议由江苏省教育会发起，召集全国教育联合会，推举代表进京请愿。省教育会还致函张敬尧，要求他：“通飭军警，对于各校出外讲演之学生，随时加以保护，以防意外。”

当时，主持湖南学生联合会日常工作的，多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毛泽东这时正从事教育工作，他虽不是学联正式成员，但却是学联工作的实际指导者。湖南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开展的抑制日货、提倡国货、反对奸商的斗争，更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他们把抑制日货、提倡国货作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运动一开始就积极进行。5月29日，湖南各团体组织了国货维持会，发表了宣言，制定了章程。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五）广州

5月11日，广州各界人士在东园召开国民大会。会场四周遍插各色旗帜，上写“誓杀国贼”、“保我国权”、“不与汉奸同中国”等标语。会议开始后，议员们和各界代表登台演说，每说到外交失败、亡国惨痛，台上台下痛哭流涕，振臂高呼：“杀尽国贼！”大会推举出8名代表率队向军政府请愿。与会群众分成99队，每队百余人，手执“还我青岛”、“誓诛国贼”小旗，浩浩荡荡地前往军政府，向主席总裁岑春煊、总裁伍廷芳提出三项要求：（一）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二）严惩卖国贼曹、章、陆；（三）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岑、伍二人应允向北京政府力争。

5月25日，广州50多所学校的5000多名学生在高等师范学校集会，南武、高师、女师、培英等校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大会决议：“电巴黎和会力争青岛、取消各种密约”，“电挽蔡子民”，“联络全国律师公会、对卖国贼提起公诉”，“组织调查劣货会”，“组织学生义勇团”等等。

根据5月25日学生大会的决定，广州各校学生5月29日举行了游行大会，这天下午，各校二、三万名学生手执写着“还我青岛”、“不买劣货”的小旗，从天字码头出发，浩浩荡荡地经过长堤、十三行、杨巷、十八甫、

惠爱街等，所经之处，万人空巷，鼓舞欢迎。

广州商界也踊跃参加了抑制日货的斗争。他们自己“不进日货，不搭日船、不用日钞”，同时还散发一种传单，劝人勿购日货。5月30日晚，爆发了轰动全城的排货风潮。贩卖日货的老威药房、华美药房的招牌和玻璃窗被群众砸碎。大新百货公司拒绝群众入内检查日货，并开枪进行恫吓，引起群众公愤，纷纷掷石块砖头袭击该店门窗，直至深夜军警赶来弹压，群众才逐渐散去。

在“六三”运动的影响下，在来粤的京、津、沪学生代表的直接推动下，6月10日广东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生首先罢课，接着公立法政、省立高师、教忠、公立医专及各中学起来响应，相继于12、13、14日罢课。

罢课后，于6月17日正式成立了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参加者共有20余校。公立法政学校的张启荣、甲种工业学校的周其鉴被推选为正副会长，阮啸仙、刘尔崧、高慕德等为联合会的职员。学联出版了《雪耻周报》，进行反帝爱国宣传。

除上述5个重点地方外，“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火几乎燃遍了华夏大地。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陕西、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等地，纷纷建立各种爱国组织，开展各种爱国活动，都在“五四”爱国运动史册上写下了光辉不朽的篇章。

五、罢免亲日派卖国贼曹、章、陆 与拒签“和约”

“五四”运动兴起，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成为众矢之的，被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地指为卖国贼，要求予以严惩。这不是偶然的，是他们长期以来屈膝媚外，丧权辱国，特别是直接与日本签订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和济顺、高徐铁路换文，从而招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必然结果。他们卖国求荣，罪有应得。

交通总长曹汝霖，早年留学日本。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的外交部次长。1915年参与和日本公使日置益谈判“二十一条”，并受袁世凯之命多次私访日使，探听日方意图，密议成交条件，起草有关文件。他还以中国的银行、矿山、交通事业等为抵押品，向日本借了大批外债，作为北洋军阀进行战争的经费，个人并从中上下其手牟利。

驻日公使章宗祥，是戊戌变法后首批赴日留学生，与曹汝霖相友好。袁世凯窃国后，任北洋政府大理院长、司法总长。从1916年6月底起，出任驻日特命全权公使。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奉段祺瑞的旨意，与日本订立了矛头指向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军队大批进入我国东北和蒙古。1918年秋，日本为了维护其掠夺到手的山东权益，除用2000万日元借款取得对济顺、高徐两条铁路的控制权外，又向中国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照会，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胶济铁路归“中日全办”等7项内容。北京政府为借到日款，不惜断送山东主权。章宗祥根据曹汝霖的电示，以政府名义，于1918年9月24日，用“欣然同意”的复照，承认了日本的上述要求。这就成了日后巴黎和会上日本攘夺山东的口实。

币制总局总裁陆宗輿，袁世凯窃国期间任驻日公使。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侵入山东。陆宗輿奉命向日表示愿划山东龙口、莱州及胶州湾附近地带为“交战区”，为日军的侵略活动提供便利。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谈判和签订“二十一条”，陆曾奉命在东京与日本外相多次密谈。1918年，他还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理身分，代表日本兴业等三银行团，先后与段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签订了“有线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收益和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日本。

曹、章、陆忠实执行了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所以当遭到人民群众反对时，反动派竭力加以庇护。北京政府庇护卖国贼、镇压爱国学生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各地各界群众纷纷起来，举行罢课、罢市、罢工。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拒签巴黎和约，成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斗争口号。通电、接连不断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此伏彼起的罢课、罢市和罢工，逼得反动派不得不考虑对曹、章、陆的处理，以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避免引起更大的政治危机。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情势下，北京政府才被迫在6月10日下令免去曹汝霖的交通总长、章宗祥的驻日公使、陆宗輿的币制局总裁职务。

曹、章、陆被免职，这是全国人民共同斗争的一个胜利成果。消息传出，举国欢腾。上海人民于6月12日举行示威游行，庆祝“五四”运动所取得的这个初步胜利。

3个亲日派卖国贼被罢免，但是山东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并未结束。

6月11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散发他们亲自参与制订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宣言要求：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6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由市民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议论自由权。

这个宣言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份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主要意义，在于告诉人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不能仅仅满足于罢免3个卖国贼，而要用“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即发动群众，用法律允许范围以外的手段，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这就为全国人民进一步指明了新的斗争目标。

这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互相勾结，进行交易，企图把我国山东、青岛的权益让与日本，并载入了对德和约草案。帝国主义这种野蛮的侵略行径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于是，“收回山东、青岛主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员极其广泛。不仅有城市里的工人、学生、店员、教师、商人，还有乡村里的农民。就连亲英美派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也表示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但是，6月17日，北京政府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按照帝国主义的旨意，在和约上签字。接着，又令代表“相机办理”。24日北京政府通电各省，通报他们主张签字的情况，说什么“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熟权利害，再四思维，如竟不签字，则嗣后挽救惟难。”北京政府的这种媚外卖国行径，再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要求拒签和约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由于和约直接牵涉到山东问题，所以山东的拒签和约运动开展得最为普遍和激烈。18日，山东省议会、律师公会、报业公会、教育会、学生会、农会、商会等团体决定派代表进京请愿。

20日中午，80多名代表齐赴新华门，向总统府和国务院请愿。他们提出下列3项要求：（一）拒绝签字；（二）废除高徐、顺济铁路草约；（三）惩办国贼。

为了支持山东代表的请愿斗争，天津各界联合会6月27日派出10名代表赶赴北京，与山东代表提同样的要求，采取一致的行动。山东、天津、北京和陕西等地代表也联合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几百名代表在新华门前伫立了一天一夜，直到6月28日徐世昌才被迫接见了其中10名代表。

当各地赴京代表在北京联合请愿的时候，上海各界人民也积极配合，开展拒签和约运动。6月21日，上海学界和商界召开会议，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为了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上海各界除了发表宣言、从事舆论活动外，还接连举行集会和游行。6月27日，各界群众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集会，北京、天津、安徽、唐山、吉林和留日学生代表均应邀出席并在大会上演说，一致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主张废除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此大会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和国内各群众团体发了电报。在给各省议会、各团体、各学校的电报中，呼吁各地“速开国民大会，对此二事一致主张”。7月1日，由于尚未得到拒签和约的消息，再次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

近百年来，惧洋媚外的中国在与帝国主义办理交涉时，总是“始争终让，几成惯例”。这次的巴黎和约，是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制订的，中国代表竟然敢于拒绝在这个和约上签字，这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确是空前的。这是“五四”爱国运动所取得的又一个胜利成果。

六、改造社会的探索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两者相辅相成。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使原来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即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从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这两年，是新、旧文化运动的交替时期。当时，在知识界出现的围绕着关于“改造社会”的热烈探索和争论，就是这种新、旧交替的主要体现。那时，既是一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又是新、旧文化思想相互排斥、相互渗透的复杂局面。这种新、旧交替的状况，在“五四”后的第一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改造社会的呼声

“五四”爱国运动争得的胜利——罢免曹、章、陆和拒签“和约”，并没有使中国人民，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分子感到满足，他们在经历了这场空前规模和革命运动洗礼后，面对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新潮流，再看看中国的社会现实，实在难以再容忍下去。于是，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想着另创一种新社会。

改造社会的呼声，在进步知识界中迅速高涨；进步期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五四”以前，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期刊，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种。“五四”后第一年中，骤然增至400余种之多。

绝大多数的刊物都宣称以介绍新思潮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旨趣”。“本现代思潮的精神，谋社会之改造”这类话，在不少刊物的发刊词中，比比皆是。

应该指出，在当时出现的刊物中，也有极少数公开站在新思潮的对立面，反对社会改造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凌荣宝个人创办的《独见》。此外，有少数刊物主要从事反日爱国宣传（如《救国日旬报》、《南开日刊》、《上海学生联合会通俗丛刊》、《杭州学生联合会报》、《黑潮》），也有侧重于某项具体的政治斗争的（如鼓吹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湘潮》、《天问》和《湖南》），但它们对于新思潮的介绍和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还是有所涉及。有的则随着时势的变化逐步表现出重视新思潮和社会改造问题的倾向。

这些刊物的创办者的社会成分，相当广泛。例如，《建设》、《星期评论》、《觉悟》（《民国日报》副刊），是在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为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或支持下创办的；《解放与改造》（后更名为《改造》），是原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集团“研究系”——“进步党”成员梁启超、张东荪等创办；《工界》，为广州中华工会创办；《宁波工厂周报》，为宁波部分民族资本家创办；《新中国》为北京新闻界创办；不过，这些刊物中的大多数，还是由各地的青年学生和进步社团所创办。据统计，五四爱国运动后一年中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

这批经受了“五四”革命洗礼的知识青年们，对于迎接新的思潮，怀着极大热忱；对于改造中国社会，充满胜利信心。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立志于改造中国社会。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中发表的文章，集中地反映了当时青年们的这种精神境界。他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

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二）百家争鸣异说纷呈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先觉的中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向外国（西方国家和日本）寻找救国的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都是向外国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由于当时还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他们学习的，都是建设资产阶级国家的学说和经验。1915年，陈独秀从西方请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以及随之掀起的反对封建思想的启蒙运动，其目的，也是为了在中国再现“法兰西文明”，把中国变成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使中国人民获得了新觉醒，使关心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先进中国人，重新放眼世界，去探索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所带来的世界新变化和新问题。新生的苏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抛弃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旧思想、旧观念。

这种认识的形成和流行，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扩大是紧密相连的。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纪元”。如果说，进步知识界在“五四”前还只有少数人开始认识或感觉到这一点，那么，由于“五四”运动的推动，它很快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观念。实际上，当时全国进步刊物的大量涌现，正是这个世界新潮影响的结果，即使离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较远的地区，也不例外。

因此，在“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很快出现了一个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数以百计的主张“社会改造”的刊物，除了《民心》等极个别公开声明“不偏取何种社会主义”外，都不同程度地对社会主义表示了好感和向往。许多刊物，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或数篇专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有些青年在文章中，把社会主义誉为“人类的福星”，并肯定地说，中国“没有建设则已，如果有建设必定要依着社会主义的原则”。

18世纪西方启蒙学者们提出的思想原则：“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被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这也正是它们在“五四”以后，资本主义制度已遭到人们的怀疑、谴责和唾弃，社会主义广泛流传的情况下，还能同时被人们当做新思潮，继续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的重要原因。

“五四”以后，伴随着社会改造呼声的日益高涨，连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许多现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也日益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开来。其中，有杜威的实验主义和罗素的新实在论，以及他们的改良主义，还有柏格森、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这些学派，都是以“平民”代表的面貌出现，从不同角度，“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又都鼓吹不需要“流血斗争”。这些，对于当时的进步青年，尤其是对那些虽有某种社会主义愿望，但对十月革命还缺乏正确理解或有某种保留、抵触的青年，自然会有较大的吸引力，这一切，都是当时人所说的“新思潮”，可谓百家争鸣，无奇不有。

（三）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

截至目前所发现的资料，在中文出版物中，最早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是

“广学会”主办的月刊《万国公报》，时间是1899年3月到5月。这期间，该报公期登载了由李提摩太（T. Richard）节译、蔡尔康撰文的英国进化论者颌德所著《社会进化论》的前3章（译文标题《大同学》）。此后，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相继出现。主要有：1920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中，以及他在次年发表的另一文《20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都曾提到马克思（译作“麦喀士”），并分别在两文的注释中说：马克思“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但他并未介绍马克思的学说，而是绝口称赞颌德的学说，认为与马克思的学说相比，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并重述了颌德以“幼稚”、“谬误”等词句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

1903年，广智书局和《浙江潮》编辑所，分别出版了《近世社会主义》（日本福井准造著）和《社会主义神髓》（日本幸德秋水著）的中文译本。这是两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同年10月，《浙江潮》第8期刊登署名“大我”的文章《新世界之理论》。该文介绍了马克思（译作“埋蛤司”）和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组织（译作“万国劳动党”），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并以赞叹的口吻写道：“今社会主义之披靡欧美，为雷奔电掣，山摧海啸之奇观。”

1906年1月，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著名政论家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第3号上改称为《列传》），介绍了马克思（译作“马尔克”）和恩格斯（译作“非力特力嫣及尔”）的生平，以及《共产党宣言》（译作《共产主义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十月革命前，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些刊物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也曾作过一些介绍。如刘师培、何震主编的《天义报》（1907年创于日本东京）1908年第15号上，刊登了恩格斯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序言的译文。该刊还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第1章《资产者与无产者》的译文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译本。1912年，在煮尘主编的《新世界》（上海出版）上，连载了由施仁荣述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大部分内容，题为《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另外，一些对社会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也在文章中提到过马克思及其学说。

从总的情况看，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只是刚刚开始接触。对它的介绍多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有误解和歪曲的，其社会影响微不足道。即使先进的中国人，也还不知道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是由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的数量很小，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也由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袖们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严重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东方和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的这段话，精辟地说明了马克思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特点。

1918年，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1919年元旦，他又写了《新纪元》。这是在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文章。作者把十月革命同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

上之革命”，是 20 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是 20 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在《新纪元》中，作者论述了十月革命开辟的“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接着，作者联系到中国，指出：“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

这几篇文章，尽管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内容还很少涉及，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开始。作者明确地告诉人们，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而布尔什维克党，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即马克思）为宗主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首先从书本上获得，而是首先从十月革命的活生生的事例中领悟到。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更为有力。十月革命“照见新人生的道路”这句话，可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同义语，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

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革命的思想武器。十月革命“照见新人生的道路”，这种醒悟，只能推动而不能代替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了解。系统地、全面地向中国人民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迫切的历史任务。

1919 年 5 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登了《马克思学说》（顾兆熊），《马克思传略》（刘秉麟）和李大钊本人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李大钊的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这是在中国人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第一次较系统和较完整的介绍。在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和鉴别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应该特别指出，1919 年 4 月 6 日，在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创办的《每周评论》第 16 号上，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与共产党人》的结束部分。这是《宣言》中极重要的篇章，它鲜明地论述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译文虽较生硬，但还是把基本思想表达出来了。当时，各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虽然还未能像李大钊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较系统和较全面的介绍和宣传，但他们中有些人已经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四）问题与主义之争

“五四”以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日益广泛的介绍和宣传，对社会进行根本解决的主张、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恰在这时，实验主义也传入了中国。

实验主义是 20 世纪初在美国颇有影响的一种“现代哲学”流派，其主要特征是：片面强调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和改良。“五四”运动暴发的前几天，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杜威，经他的弟子胡适邀请，带领着妻女来到中国。

杜威到北京后，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等 5 种长篇演讲，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扬了实验主义。在讲演中，他还直接谈到中国的社会改造问题，并俨然以指导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他说：“中国常有人问我‘改造社会当从何下手？’我的答案必说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学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一处不应改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只有各做各的事，那种笼统的理论最容易被利用，是没有用的。”他所谓的“笼统的理

论”，“被人利用”，显然是指李大钊热心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和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

杜威毕竟是以外国学者的身分到中国来的，如果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根本改造中国的社会的主张，主要是通过宣扬实验主义的方式进行的，那么，胡适就有所不同。胡适是他在中国的高足，又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位知名人物，面对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新趋势，不能不使他产生出一种按捺不住的焦急心情。对此，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这个趋势的危险……”又说：“那时……国内‘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谈政治。”恰在这时，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李大钊也因避免追捕正准备离开北京，胡适乘机取得了《每周评论》的领导权，并随之改变了该刊的政治方向。从26号（6月15日）起，《每周评论》大量刊载杜威的讲演录，抛出了他的“政治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在这篇文章里，胡适历数谈“主义”的种种“教训”，甚至抹去斯文，进行嘲讽谩骂。他说，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胡适“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他说：“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又说，如果“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地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很明显，胡适反对谈“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根本解决”。他在该文的结尾，说得更明白：“‘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胡适反对的“主义”，从他当时总的政治倾向和该文的锋芒所指，可以明显地看出，是针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他不仅于此。在该文中，他除了表示反对“高谈社会主义”外，也反对“高谈民生主义”和“高谈无政府主义”。因为，民生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在某种意义上承认“根本解决”。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首先写文章反对他的，是一个同马克思主义没有甚么干系的篮公式（笔名“知非”）。篮是《国民公报》的编者，他在该报转载了胡文，并发表了自己写的《问题与主义》。篮文从多方面论证了宣传主义的必要，对胡文给宣传主义列举的三条“教训”，逐条予以驳斥。但他是以唯心主义立论的。由于他侧重从思维逻辑方面进行论证，对于胡适否认“根本解决”这个要害问题，未能直接予以反驳，只是提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用这种观点来与之对立。

胡适立即将篮文转载于《每周评论》第33号。

李大钊在离北京前，已看到胡适的文章。他到昌黎县五峰山后，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该文的特点，是从强调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来论证宣传主义的重要。首先，他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

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为此，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为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灭。”接着，他论述了主义必须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理。

针对胡适借口谈主义“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的论调，李大钊指出：“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系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宣传。”李大钊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最后，李大钊明确指出：对于一个“若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他从俄国的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两方面予以论证，他说：“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都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在这里，李大钊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和“根本解决”的关系，他指出：“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

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胜负究竟属谁，很难用当时的社会影响来判断。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提示了中国社会改造的一条重要的规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解决”，以及预示了即将在社会实践中作出的回答。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甚至是更为有力的条件。这对于正在竭力破除“一切权威”和“武断盲从”的“五四”青年说来，尤为重要。可以说，不通过他们直接的，或为他们耳闻目睹的无可辩驳的经验教训，他们是不会对某种学说深信不疑的。

七、走十月革命的路

“五四”运动一年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来，并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与此同时，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一批坚信马克思主义、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的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从而导致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主义者，还不懂得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对于怎样具体改造中国社会，还在继续探索中。因为，承认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当时不仅意味着承认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以及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意味着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当时中国的国情来看，这显然是超越革命阶段的。尽管如此，他们在怎样改造中国社会这个重大议题的认识上，毕竟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当时，是否承认走十月革命的路，包括是否承认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成了是否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公认的标准，也是当时共产主义者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的焦点。

1920年，“五四”周年前夕，明显地出现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利形势，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日益唾弃，同时，还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中国人民对苏俄政府对华宣言的热烈反响

1919年夏天，苏俄红军击溃了高尔察克的反革命军队，胜利地进入西伯利亚地区。7月25日，苏俄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名义，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废除以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宣言“建议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政府立即与我们建立正式关系，并派遣自己的代表与我军会晤。”但由于中国军阀政府的封锁和控制，该《宣言》直至次年3、4月间，才先后在《上海生活》（俄文版）和《东方杂志》上发表。

《宣言》还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愿意“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拒绝接受中国因1900年义和团起义所负的赔款”和“废除一切特权”等。《宣言》还表示：“如果中国人民愿意象俄国人民一样获得自由，……那就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宣言》一发表，立即在中国的文化、工、商等界获得强烈反响。“世人都称是‘过激党’，大家又说他很残忍；照前天的俄国劳农政府致我国的通牒看来，实在有些不然；真是可以令人五体投地，表示无限制的欢迎。”对苏俄的这种认识，在当时比较普遍。

中国人民还从《宣言》中获得了巨大鼓舞。上海学生联合会认为：“对俄的表示，单是拍电报、发宣言是没有用的。……他们既然这样真挚地希望我们，我们便应该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为自由而力战’的成绩出来，才真是不负俄人，抑且不负自己。”全国各界联合会表示：“刻下已经觉悟之中国人民，正准备与一部分极顽朽之官僚武人政客奋斗，无论如何牺牲，均所不辞。”

上述反映，虽然并不意味着人们已经同意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有利的。

二、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

辛亥革命后，从1913年起，在广州就出现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1918年五月，无政府主义者编的上海《劳动》月刊第三号上，也曾经介绍过“五一”劳动节的意义。次年“五一”，北京《晨报》副刊出了一个《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在该号发表了《“五一”节杂感》。他预言：“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相同了。”事实证明，李大钊的这个预言是正确的。1920年“五一”，《新青年》、《星期评论》、《新社会》、《晨报》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都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新青年》的纪念专号共约400页，超过通常页数的一倍以上，其中除了知识界写的纪念文章和工人生活调查报告外，还有工人和工界人士写的反映工人阶级觉悟的题词。蔡元培、孙中山分别写的“劳工神圣”、“天下为公”的题词也刊登在这一专号上。此外，上海《新妇女》、苏州《妇女评论》等刊物，也发表了纪念文章和有关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五一”这一天，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举行了纪念活动。

此后不久，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北京、湖北、山东、广东和湖南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党的支部或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这些组织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能够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从而出现了新局面。

各地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创办适合工人阅读的小型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广州的《劳动者》和北京的《劳动音》等；二是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区举办工人业余学校，如“长辛店劳动实习学校”，“沪西小纱渡劳动实习学校”，武昌第一纱厂、汉口英美烟草厂和汉阳兵工厂的“工人识字班”等。

为了全面、系统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译本；9月，再版一次。不久，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相继翻译出版。这样，科学社会主义的代表著作，就在中国广泛流传了。

如果说，在“五四”时期的历史条件下，从民主主义的思想出发，而又保留这一思想的某些原则，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他们要继续前进，成为共产主义者，就不能再囿于这种状况了。他们所面临的，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尖锐课题；这同构成民主主义思想的个性解放和天赋人权等基本原则，是直接冲突的。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在已经出现的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在新的课题面前退缩了，甚至与之对立，背道而驰；能够继续前进，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只是其中的少数人。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比较重视实际革命斗争，把自己学得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同实际斗争相结合，从而使自己在政治思想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坚定地相信科学社会主义，坚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八、“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既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把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和动员起来，为挽救国家的危亡和争取民主自由而战斗。富于敏感的青年学生在运动中起了先锋作用。“六三”以后工人阶级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由于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使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和拒签对德和约，得以实现。从5月4日到6月28日的这场政治斗争，就是“五四”爱国运动。

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开始，中国就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随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分化。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经过他们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的培养上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分水岭，自鸦片战争开始以来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